



美国《音乐中国》(Journal of MUSIC CHINESE) 主编

周勤如评 《满族萨满乐器研究》

《满族萨满乐器研究》，刘桂腾著/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9/中英文目录/杜亚雄序，乌丙安序/正文187页（含图像及章节附录）/索引32页/后记/850×1186/精装/¥40。ISBN7-80644-317-7/J·30

《满族萨满乐器研究》是一本以结合着文化学的民族乐器学理论为指导，收集、研究残存在中国古老的满族文化中的满族萨满乐器的专著。萨满文化的根在中国满族人的祖先，它的遗迹散落在世界上很多地方，以各种变体残存着。对这种文化遗迹的研究是人类学的一个重要的项目，而这本书从乐器学的角度设立专题研究则填补了其中的一项空白。全书分四部分。第一部分综论满族人萨满信仰的起源、祭祀活动的类别以及与各种民间的和宫廷的祭祀活动相配合的音乐制度、音乐观念、乐器种类及表演功能。第二部分按膜鸣乐器、体鸣乐器和弦鸣乐器三类，一一描述满族萨满乐器的形制及其象征。第三部分以民间和宫廷的各种祭祀活动的场地、民俗环境和节目内容为个案背景，一一观察其乐器的配置和使用，并概括这种配置使用的文化特征。第四部分实际上是支持前三部分的图释集汇，包括有关祭祀的历史图片和作者及他人摄制的现场照片、乐器图谱和其他参考性图片。

民族乐器学研究属于一种系统化研究。编纂民族乐器志一类的工具书是一种提纲挈领的基本工程，而深入挖掘某一地区、某一民族或某一民族分支的器乐传统，用科学描述的方法，从形制、工艺（包括有文化涵义的制作过程）、演奏法、配置、功能、价值、音乐演奏实例和历史传说等不同层次的“物化形式”（刘桂腾语，P. 185, 202）入手，进而推论出对核心层次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理性认识，则是使这一研究深化的必要途径。传统的民族艺术之所以能够长存，或曾经在逝去的社会条件下长存过，总是有它与某一方热土息息相关的、动人心弦的奥妙之处。这正是为什么包括本书作者在内的许多研究者，一旦深入进去便被吸引住，而终生投入、探索不辍的原因。这种跃然纸上的热情是每一个读者都可以在阅读中直接感觉到的。

问题的关键是：有了热情是不是就能把研究做好，“好”又如何衡量。笔者还想重提自己发表于《黄钟》1997年第四期的一篇有关音乐论文写作通信中的一个观点，即我们所谓的“研究”实际上是分两步走的：首先是穷尽材料，即research，其次是求索结论，即study。两者缺一不可，各要各的功夫。西方学者从来就有这两个概念，会自然有所侧重，所以他们不需要特别讨论这个问题。而我们中国学者是长期在“研究”这一个笼统概念下认识问题的，虽然实际操作上一定也是先调查再研究，但对二者功能上的区别、程序上的联系和操作上的规范并不是每个人都十分明确，这从许多已经发表了，不是缺少充实的论证材料（“无底气”）就是缺少鲜明的建设性观点（“无神”）的论文中就可以看得出来。所以笔者在计划发表一系列通信时首先提出了这个观点请大家注意，也一直用这个标准来评价音乐文论：两者兼备是上乘之作；退而求其次，材料充实可信但观点并不可靠或并不高屋建瓴也可以是有益于进一步研究的综述性论文；比较不可取的是缺乏充分材料和论证的空洞文论，虽有观点但立不住。这里，请注意，“穷尽”是一个动词，即“尽可能达到尽头”的意思。“穷尽材料”指的是“尽可能详尽地收集和提供与主题有关的论证材料”的意思，而不是说材料一定要“穷尽”才能写作，也不是说研究不可以有阶段性目标。提倡“穷尽”，就是提倡一种积极进取的探索精神，一种尽量利用现有的条件把一项研究做得深入、完备的追求，一种对读者、对后世负责任的态度。而要做到“穷尽材料”，首先要有“踏破铁鞋”搜寻的精神。这对于我国众多的处于基层文化机构的民族音乐研究者来说并不是难事，我们从延安的民间音乐研究开始从来就是这么做的。但这仍不够，还必须有掌握最有效的（常常是但并非绝对是最先进的）田野工作手段和程序的专业素养、洞察采风现场的敏锐感觉和深度挖掘材料的随机应变能力才行。另外，在有必要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应该长期“蹲点”，进行体验性研究。在这方面，通读一下《满族萨满乐器研究》全书就会知道，

作者正是通过较充实的田野调查和旁证国内外文献来穷尽材料的，而且是比较严格地按照民族乐器学的规范来尽可能深入细节性描述的，特别是每件乐器和事件都附有图示或照片，或两者兼而有之。本书的语言也十分简明、准确，信息含量很高，并尽可能附有乐器或事件专名的满语拼音作参考。可以说，作者所能够得到的材料都向读者提供出来了。这种“资料共享”的开路先锋意识是十分宝贵的。

在材料的收集和提供方面，笔者想提两点不足，但与其说是批评这本书，不如说是借题发挥，探讨在现代条件下如何穷尽材料，请作者见谅。

其一是缺少乐器分布和田野调查地理示意图。与摄影摄像和录音记谱技术一样，地理示意图的制作对民族音乐学研究者来说应该是一项必备的工艺，而本地地图的收集应该是田野作业的一个常规项目，因为图像的直观性和生动性对不熟悉文论主题的读者来说一方面从心理上加深印象，一方面也启发思考联想，其效果不是在行文中交代一下某县某乡某村就能达到的。民族乐器学直接牵涉到地理分布的空间概念，地理示意图就更不是可有可无的了。另外，由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地点常常在普通地图上被略的偏远地方，研究者如果不是每深入一地都注意收集当地出版或地方机关内部使用的地图，恐怕离开之后自己都说不清那些确切的采风点在哪儿，而再回去一一补查是不可能的。还有，中国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常常是和史学研究结合在一起的，许多旧地名如果作者不随时交代清楚，读者弄起来就很费周折。科学的目的是促进生产力的提高，论文作者增强对读者的“服务意识”是提高论文流通和影响力的有效环节，切不可掉以轻心。

其二是对可能恢复表演的祭祀仪式演奏缺乏完整的个案纪录。我们当然理解这著作是作者上世纪90年代的上早期研究成果，客观环境的限制和作者的主观条件都还没有成熟到可能把材料“穷尽”到这种程度。但无论如何，这个缺陷使得这本书的分量达不到震撼的效果。个案记录可以根据情况采取切实有效的手段，使其能够最大限度地再现现场表演。以文字、图片、谱例为主的描述是一种，现场录音是一种，但更有效的恐怕是录像。笔者在上世纪80年代末看过门特尔·胡德（Mentle Hood）制作的一部有关加纳阿通旁鼓的制作过程的35毫米纪录片，从选树、祭树、砍树、制作（其中有很多制作师傅的话）到制成庆典，生动地能过一件乐器的描述剖析了一个民族的传统和灵魂。不到一小时的电影震撼了每个学生的心，一下子就把大家和现场拉到了一起。这就是具有生产力的学术水平。这就是尽量利用最有效的手段收集和提供材料的科学精神。不要以为国外的研究者汉“穷尽”的追求精神通过艰苦努力就可以达到这种效果；他们之中凡有成就者在工作时的敬业态度是一般人怎么想都不为过的。实际上，现在我们国家的物质条件已经发展到了大多数研究者只要努力就可以得到的数码音像设备和掌握技术的水平，也就是说胡德教授当年有的硬件我们也可以有了，关键就是我软件是否有驾驭硬件的能力了。

从另一个角度来衡量，即作者是否在充分展开材料的过程中有机的论证和抽象出具有建设性的结论，这本书也是做得相当好的。全书的论证实际上是在前三部分展开的，先综述与宗教文化背景有关的内容，再分述每件乐器，然后个案描述在祭祀音乐中乐器的配置使用。第四部分更像一个内容庞杂的附录或者其实可以改作几个专题附录，但这是结构问题，与前三部分的正文无伤。作者的研究功力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作者对当代民族乐器学的基本理论是了解的，这可以从作者收集的第一手材料的系统化数据上看出来，也可以从作者的论述思路中看出来。其二是作者对材料的分析、归纳和推论是透彻的，所以他可以在第二和第三部分比较自如地把自己的第一手材料和引证的支持材料有机地穿插在一起，夹叙夹议，事半功倍。其三是作者有很高的概括抽象能力，把整个研究的精髓浓缩为“万物有灵”的物化形式”这一精辟表述，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这本书附有文献目录和名词索引，给读者很大方便。参考文献目录的问题通过近几年的讨论已经形成共识了，但许多作者可能还是觉得“名词索引”是个不必要也无从下手的累赘，出版社也并没有把这个附录作为要件看待。这主要反映了我们的学术研究整体对系统化的自觉要求在观念上还比较薄弱，从作者的角度看则是“服务意识”薄弱的反应。须知，服务读者就是服务自己，最大限度地提供读者方便就是最大限度增加自己著作的影响力和流通量，何乐而不为！现在的电脑文字处理软件如MSWord等都有索引（Index）功能，相信也可以处理中文，所以操作上已经不是难事，应该克服惰性、向前进步。另外，这本书的精装设计也颇具匠心，但正文排版在字体运用、大小比例、距离位置等细节上还有改进余地以便阅读和审美兼顾；首页的作者特写照和透明纸简历显得张扬，一般放在平装封底或精装封套的内折上即可。

我与本书作者素未谋面，只是前几年在《中国音乐学》上读到他的文章，觉得好，于是通过电子邮件进行工作联系。他在书中自称并非学院出身，是一个亦官亦民、特立独行的“个人奋斗者”（后记，P.220）。他的可贵就在于身为地方文化干部却善于把局限性转化为有利因素，其关键是改变观念和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成为一个有效率、与时俱进的开拓者。虽然本文写得晚了一些，可能他的更好的新著快要出版了，笔者还是乐意向音乐学界的朋友们推荐此书。它并非尽善尽美，但充满着希望。

